

危机的地缘经济学

摘要与结论

1

特朗普政府任内的美国政策，正让世界秩序趋于瓦解，并将一个重大选择摆在其他国家面前：如何在一种既不同于过去、又远未定型的国际格局中找到自身定位。一些分析认为，当前世界正进入一个“失序”（un-order）时期：旧的规则已经失效，新的规则尚未形成。¹ 国际关系体系中已经显现出裂痕，究竟往何种方向发展，取决于美国以何种方式跨越它所面对的两大障碍；不同的应对方式，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结局。

2

第一个障碍，来自两种技术创新模式之间日益鲜明的对立。其一是美国模式：完全由市场主导，产业高度集中，且拒绝任何形式的监管。其二是中国的分布式模式，在这一模式下，中央层面设定的目标，能防止少数企业占据支配地位。² 美国面临的问题是：中国模式正被证明行之有效，不仅使中国在诸多领域取得领先地位，还在人工智能这一前沿领域与美国展开竞争。至于中美之间传统技术差距的缩小，也不能仅仅归因于国家的大规模补贴。实际上，美国模式同样依赖公共预算：一方面来自国防军事开支（这也解释了，为何美国寡头企业越来越热衷于人工智能驱动的新一代武器）；另一方面来自同样巨量的税收减免，尤其是最近借所谓《大而美法案》推出的减免措施，这些政策显然受到股市的欢迎。另一些分析则指出，中国模式的成功，还在于中国能够走出与美国产业不同的增长道路。例如，中国要求本国企业放慢创新步伐，以避免依赖最先进制程的芯片，而这类芯片如今只有美国一家

¹ Leonard M., *Surviving Chaos. Geopolitics When the Rules Fail*, Polity Press, 2026.

² 技术创新应设定何种限度、是否应当暂停，美国国内对此争论不休，就连几家技术寡头内部也意见不一。参见 *Anthropic chiede una pausa per i modelli di frontiera*, AI4 Business, 5 giugno 2026。

大企业能够生产。³最后，天平或许已不再向美方倾斜。教皇良十四世的通谕《伟大的人性》同样印证了这一判断。这份势必产生深远影响的通谕，表达了对某种技术官僚范式的忧虑：这一范式既缺乏共同规则，又在催生新的不平等。

3

美国政府面临的第二个障碍，在于其是否真能影响国际贸易格局的走向。特朗普政府任内采取的贸易政策，意在重新主导国际贸易格局，在双边基础上就“交换什么、交换多少、以何种价格交换”展开谈判，条件是同各伙伴国签署的协议须有利于美国经济。这一做法显然背离了多边主义这一前提，而多边主义正是国际自由贸易体系得以维系的根基。不过，即便在贸易政策上，美国所能施加的影响力也日趋有限。美国仍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但若美国只在实体经济层面行动，不同时动用金融与军事手段，那么它可能不再有足够的影响力，去迫使世界其他国家接受其期望的利益分配格局。

4

本报告分析了全球贸易格局正在经历的转型及相关生产一体化进程的演变。我们将其作为一种解读视角，用以理解美国的选择，也用以检验其选择的局限。为此，本报告专门编制了“贸易偏好指数”，并据此重新确定主要经济体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战略定位。报告的主要目标是验证贸易是否正在出现区域化趋势，换言之，分析的目的是检验带有地缘偏向（而非地理上中立）的生产一体化，是否正在占据上风。这种一体化，是由政治上对立且封闭（或可被决策者人为隔绝）的经济体系构建而成的。对区域化假设的研究，也有助于评估美国能对其所属阵营施加何种影响。⁴

³ 关于这一主题的时事评论，参见 I. Deng 与 A. Cao, *Another “DeepSeek moment”? Huawei milestone alters China trajectory in chip rac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9 maggio 2026.

⁴ 贸易偏好指数详见本报告第三章。第一、二章更新了关于全球化现状及意大利经济国际地位的年度分析。

5

从贸易全球化到贸易区域化的转向，是学界热议的话题。近年来国际贸易体系不断遭受冲击，破坏了全球价值链，也催生了诸如“回流”（backshoring，亦作“产业链回流”）、“近岸外包”（nearshoring）以及最近出现的“友岸外包”

（friendshoring，即将供应商限定于盟国，把地缘政治风险纳入全球贸易考量）等术语。然而，经合组织最近发布的数据并不支持“去全球化”这一假设，反而显示出价值链正在迅速适应国际格局的变化。⁵尤其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出现产业链回流的现象。然而，特朗普政府却屡屡提及产业链回流，并宣称要动用关税，迫使跨国企业赴美生产，以免失去进入美国本地市场的资格。我们认为，人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常常扭曲了视角，把全球化进程中本属正常的演进误读成了倒退。

6

报告数据证实，国际生产一体化趋于放缓。但这一结论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依据收益递减这一简单原理，全球化不可能无限期加速。而这一加速进程，对应的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直至 2008 年大危机前夕这二十多年时间。甚至可以说，真正反常的，恰恰是全球化在这段时期的迅速发展。报告还指出，自新冠疫情危机以来，限制贸易的措施有所增多。报告同时强调，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终究会出现成本与收益分配问题。当前美国政府选择以对抗的方式，在多边合作框架之外处理这一治理议题，但这一选择可能收效有限。⁶ 报告数据显示，主要贸易中心继续在高

⁵ 此处援引的是出口额中的外国增加值数据。文献参见 E. Keeble, A. Kholi, C. Webb, *Globalisation isn't dead. It's reconfiguring. New insights from OECD Trade Value Added data*, Blog OECD, Parigi, 12 May 2026.

⁶ 特朗普政府的立场，源于全球化对美国制造业造成的破坏性冲击；而重振本国生产的承诺，在最近一次选举中成为凝聚共识的重要支柱。关于全球化对美国制造业非对称影响的剖析，参见 L. Gagliardi, E. Moretti e M. Serafinelli, *The World's Rust Belts: The Heterogenous Effects of Deindustrialization on 1,993 Cities in Six Countries*, NBER, Working Paper, n.31948, December, 2023.”

度一体化的多边体系中运行。世界贸易格局的突出特点，在于贸易的等级秩序始终动态演变之中。在现有格局内，美国的领导地位已经削弱。若无法达成新的多边治理协议，这一趋势恐怕很难逆转。

7

对全球主要经济体作分项考察，可得出若干尤其值得重视的动向。中国的贸易格局显示，其生产一体化正经历选择性重组，旨在通过对冲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带来的影响，巩固自身在发展中经济体中的地位。美国历届政府为遏制中国影响力所作的各种努力，因此事与愿违——这些政策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反观美国，偏好指数显示，其与亚洲—大洋洲地区（不含中国），尤其是与欧盟的贸易联系在增强。在这一格局下，出现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结果：特朗普政府推行的贸易保护政策并未冲击到中国，全部压力反而都落在了美国的传统及新兴战略盟友身上。之所以造成这一局面，是因为美国经济无法降低对进口的依赖。换言之，美国无法推动企业采取切实可行的回流战略。

8

就欧盟而言，其制度架构（包括扩员进程）使之成为区域化指数最高的地区。然而从动态趋势看，即便在欧盟区域内，占主导地位的同样是跨区域的一体化。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盟对美国的贸易偏好指数更是明显上升。换言之，过去十五年间，来自美国的商品需求支撑了欧盟对外影响力的拓展。与此同时，欧盟对世界其余地区的贸易偏好指数均有所下降。因此，欧盟在面对美国贸易政策转向时显得格外脆弱。意大利亦不例外，其对美贸易偏好虽在增强，但与亚洲市场的贸易整合程度却偏低。

9

总体而言，报告呈现的数据，为从地缘经济学角度解读当前国际关系危机提供了依据。我们尝试从四条反思路径展开论述。

首先，区域化现象的出现，并非预示着封闭贸易集团的形成，而是生产网络的重组，这种重组旨在维护全球市场的整体规模。换言之，邻国之间更紧密的生产一体

化，并非为了把贸易收缩在一个有限的区域之内，而是为了维持在更遥远出口市场上的竞争力。由此观之，区域一体化本身应作广义理解，即旨在扩大全球经济的规模，将尚未被纳入的国家纳入全球经济。

在这一重组过程中，扮演主角的是净出口国，这些国家的价值链设计以争取海外市场份额为导向。直到 2010 年代中期，中国一直在扮演这样的角色。如今，一大批新兴经济体亦是如此。这些国家与战后欧洲国家类似，依靠面向国际竞争的产业扩张，推动早期的发展。欧洲各国作为净出口国，也理应能从容应对生产一体化的调整，而这种调整正是以增强出口能力为目标的。

与之相对，处于弱势一端的是美国。对美国而言，国际一体化主要用来满足国内消费；在这一过程中，其国民账户余额持续失衡（私人部门、公共预算与经常账户同时赤字）。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版图之中，美国的优势地位已然削弱，这也是引发当前危机的原因之一。

10

报告分析的第二个要点是，世界秩序已然完成从霸权型格局向双头格局的过渡。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尤其是政治上具有同等的影响力。双头格局治理本身已十分复杂，而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的是，我们今天面对的，并非领导权在两个相似且可相互替代的主体之间平稳交接，这与当年英国霸权过渡到美国霸权的情形并不一样。今天互相比量的两个国家，其深刻差异集中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创新模式几乎截然相反，二是社会组织形态同样无法相提并论。这令其他国际行为体、尤其是西方阵营难以适应，因为人们对美国体系的方方面面了然于心，但对中国经济模式的特点却知之甚少。在我们已然进入的“失序”格局中，如何弥合这两种异质体系之间的认知鸿沟、找到双方能够共同接受的合作规则，正是当下所面临的挑战。

11

我们要指出的第三点关乎欧洲。欧洲的财政规则确立了欧洲模式重商主义的性质。在这一模式下，由于欧洲国家内部需求长期疲软，其发展的主要动力只能来自贸易顺差的积累。欧洲国家须认识到，欧洲的福祉能否延续，取决于其他国家是否愿意

消化欧洲的庞大产出。如今，美国正越来越多地扮演着这个“消化者”的角色，而美国也完全有理由不再承担这一角色。如今欧洲想要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必须提振国内需求，尤其要大规模重启投资，且这些投资最好不要只集中在军工这一领域。与此同时，欧洲还应推动贸易伙伴的多元化，尽可能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12

以上各点表明，国际生产一体化进程已达到相当深度，且仍在持续演进。便是体量最大的国家，也难以回避其所构成的约束。然而，极端严重的地缘政治冲击有可能大幅收窄贸易的范围，迫使贸易流向转向少数贸易伙伴。这正是我们在报告中提出的第四点反思。我们援引俄罗斯联邦的案例：在我们考察的国家中，俄罗斯是唯一一个贸易偏好指数出现剧烈波动的国家。这一变化与乌克兰危机及其引发的全面脱钩密切相关，涉及贸易网络结构、金融市场准入条件，以及与西方国家的制度关系等多个方面。当今世界，武装冲突频发，俄罗斯案例恰可提醒人们：商业与生产一体化进程正面临何等巨大的风险。这一风险同样要求我们秉持多边主义，革新世界经济秩序。